



张仁奎等在剑山东麓为张謇植纪寿林合影,1919年

南通老照片

## 江海风物

我家的这只“细瓢儿”有了多少年历史,我也说不清。只知道,自从我有记忆的时候起,它就存在了。之所以叫它“细瓢儿”,是因为我家还有“大瓢儿”。

“瓢”为形声字。字从票从瓜。“票”意为“掠过”“轻拂”。“票”与“瓜”联合起来表示“一种瓜果,对半切开,可以当舀水器,舀水时通过轻拂水面舀起清水”。本义:一种可以制作舀水器的瓜果。这种瓜果称为“葫芦瓜”(我们那里的土话叫“葫子”),“葫芦瓜”初为青色,长熟后为白色,长老后为黄色。故“瓢儿”均为

## 细瓢儿

□何泰

黄色。“瓢儿”的制作程序是:将“葫芦瓜”用锯子锯开得到两半,“两半”即两个“瓢儿”,然后取出“内囊”,用草木灰吸尽“葫芦壳”上的水分。“葫芦壳”上水分吸尽后,拿出去在阳光下晒上几天,那“葫芦壳”就成了可以使用的“瓢儿”。“瓢儿”一般当作舀水的工具使用,也有的用来当作普通容器,盛粮撮谷物等。

我家的这只“细瓢儿”是当作普通容器使用的,这只“细瓢儿”可盛1斤大米。对这只“细瓢儿”我有两个印象较深。一是小时候过年期间,邻居们给了

花生、蚕豆之类的炒货,我喜欢放到“细瓢儿”里衬一衬,看看大约有了多少。二是上小学时,班主任陈老师到我家家访,我母亲一时手足无措,就拿着“细瓢儿”到邻居家借了一瓢儿面粉,回来后摊了一小锅摊饼,摊饼上洒了点葱花、盐花。摊饼端上桌,又倒了一碗白开水,那陈老师吃得鼻尖直冒汗。我坐在一旁,嘴丫里盛着饅水。等到陈老师走了,我把剩下的摊饼吃了,嘴丫上盛的口水也咽下去了……

这只“细瓢儿”多大年龄我说不清,但我估计跟我年龄应当差不多!

## 海陵旧话

如皋城区古代是海滨盐场,西北部成陆较早。东晋初年,因北方异族入侵,黄河流域的汉族人纷纷南迁。如皋人口增多,升场为县;隋代又降为场;五代时属南唐,复为县。元末战争,“闾阎皆货殖”的县治成为“井邑元人烟”。明朝统一全国,百废俱兴,如皋县治逐渐繁荣。嘉靖三十三年(1554),掘濠河,筑城垣以防倭寇。城圆形,围七里。当时被围人城里的农民可能迁出不少,但城内西南隅还留下了一个支家庄,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,这一带仍然沿用这个地名。

我国历来多数居民集居的地方,以姓氏作地名,如张家庄、李家桥等。我于1929年生于如皋城里,幼年即听老人说:“公共体育场之西是支家庄。”但这一带并

## 如皋城里的村庄——支家庄

□周思璋

没有姓支的人家。1942年左右,西门外大街开了一家万昌棉线店,老板姓支名万有,住在西门外尽头邱家园。这一带田少人多,居民多数种植瓜果蔬菜,也有的在城里做工。支万有比我年长二十岁上下。虽然开店做了老板,仍然是农民模样。他将洋纱放给农民加工成棉线,或卖或换纱。他家原来种田兼打棉线,不知他家祖上是否从支家庄迁来的?是否还有其他本家住在那里?

如皋姓支的人很少,其他地方也不多。《百家姓》里有姓“支”的。《辞海》上注云:古代姓支的汉人,祖先源于中亚的“月氏”(读为“密支”,也作“月支”),后人迁居中原后,被汉族人同化,即以种族名为姓。

如皋筑城至今四百多年,地名变化较

大。我幼年曾听老人说:“支家庄原来比较大,东起公共体育场,南至城脚,北至沈家巷和吴家巷南端,西北至城隍坟(纪将军墓)。可能当初建造公共体育场和孤幼小学时都曾占用了支家庄的一部分。1958年冬成立如城人民公社,原支家庄的农民和田地都并入城中蔬菜大队,直到人民公社解体。现在的安定广场大部分是原来的公共体育场。西边这一大片原来都属于支家庄,现在全部变成居民大楼,支家庄已毫无踪迹了。

从前如城有一句俗谚:“支家庄的土地庙——一进三堂。”如皋城里城外有不少土地庙,大都是一间矮小的三架梁,有的进门还要躬身低头。支家庄的土地庙在吴家巷南端,吴公馆照壁南,是三间相连朝南的三架梁小屋,不知当初是何人为首倡建的。

## 1962年南通创建传染病防治院

□程太和

作为南通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主战场,自春节前夕,南通三院收治全市首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至3月上旬,在一个多月的抗疫战斗中,27名确诊患者在南通三院得到完善的治疗,实现“患者零死亡,医务工作者零感染”的喜人目标。南通三院的前身即为南通市传染病防治院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党和政府对传染病的防治工作十分重视。1962年1月,南通创建传染病防治院。“文革”期间(1969年12月)撤销。1976年5月南通重建传染病防治院,院址在青年中路63号。建院初,传染病防治院设病床150张,病房分呼吸道病区、消化道病区。对发生的传染病,能及时管理传染源,切断传播途径,使某些传染病的流行基本得到控制,同时,逐步掌握了气管切开技术,为抢救窒息病人争取了时

机,有效地降低了一些传染病的死亡率。1985年医院病床发展到210张。1987年增至300张,全院医技科室设有药房、检验科、放射科、心电图及超声波室、B型超声波室等。金荞麦和水飞蓟宾药效研究获江苏省颁发的科研奖。现南通三院为三级甲等医院。医院占地面积51682平方米,建筑面积7万平方米,开放床位1200张,现有职工1200余人,设有两个门诊部、43个临床医技科室、两个紧密型医联体(新城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文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)、3个社区卫生服务站(所)。拥有飞利浦3.0T磁共振、256层螺旋CT、医科达直线加速器、大型平板DSA、海博刀系统、3D高清腹腔镜、ECMO(人工肺)等医疗设备近千台(件)。医院就医环境舒适,是南通市“花园式单位”。医院重视人

才储备与培养,拥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人员、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、江苏省“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”培养对象等高层次人才40余名,硕士、博士200多名,高级专家近300人,硕士、博士生导师20余名。在省、市级学术团体中担任主任委员、副主任委员、委员等职120余人。对传染病的治疗是南通三院的传统强项。医院除能正确诊断治疗传染病外,还对某些传染病的发病过程及恢复期进行血清学调查、带菌调查,以探索传染病的来源和涉及的范围,制定相应的防治措施。近年来,南通三院获得了“全国文明单位”“全国职工职业道德建设十佳单位”“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”“全国五一劳动奖状”“全国卫生系统先进集体”“全国医德建设先进集体”“全国卫生系统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”等多项国家级荣誉。

## 启海记忆

## 海门与张家港的历史渊源

□李元冲

张家港市原名沙洲县,建于1962年,之前曾分属于常熟、江阴及通州(今南通)三地,1986年撤销沙洲县设立张家港市。张家港市与今天的海门市相距百里之遥,并且中间还隔着长江,到底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呢?这要从张家港的移民说起。张家港市是一个移民城市,其移民人口的构成可以从语言中找到答案。据《沙洲县志》(1992年版)记载,张家港的方言片区主要有两部分,即南部地区说“江南话”,北部地区(又称沿江地区)说“沙上话”。如细分的话“江南话”中有虞西话和澄东话,“沙上话”中有老沙话、常阴沙话(又称崇明话、新沙话)和江北话。在张家港的总人口中,讲老沙话的人口最多,占31.94%;其次是虞西话,占25.19%;崇明话的占21.11%;澄东话的占17.7%;其他方言(如江北话等)占4.06%。而老沙话和崇明话是同一种语系,是根据移民到来的先后而分成了老沙话和新沙话。讲老沙话的人是早先的靖江、海门等地来沙洲上垦殖的移民,讲崇明话的人是稍后一点来垦殖的移民。所以《沙洲县志》将老沙话和崇明话归类为“沙上话”是科学的。“沙上话”是张家港的第一大语系,占人口总数的50%以上。

崇明与张家港相较海门更远,在张家港的移民史中,也未有崇明人迁移到张家港的记载。那么张家港的崇明话是那里来的?其实讲崇明话的张家港人,他们都是海门移民的后裔。众所周知,海门也有两个方言片区,即南部地区讲沙地话(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二)、北部地区讲江北话(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)。海门南部的大多数居民是从崇明迁徙过来的,所以海门人创造的方言“沙地话”和崇明话是同一种语系。

那么海门人是如何迁徙到张家港去的呢?这里先要从海门的历史说起,海门设厅后的地域,东起黄海边的高枝港(今属启东秦潭港镇),西至狼山东南的老洪港(今属南通开发区竹行街道),东西长50多公里。所以清代时的海门厅域(包括民国时期)与现在的海门市域,概念差异很大。现在的海门市域与南通市域是南北向划界的,但清代和民国时期海门与通州是东西向划界的,即以海界河(全称为通海界河)为界,从海界河的黄海入海口——高枝港一直向西,流经约40公里后到水流镇(今海门三星镇与通州区二甲镇交界处),其北为通州,其南为海门;再从水流镇向南流经约10公里后至通海镇(今通州区川姜港与海门高新区交界处),其西为通州,其东为海门;最后从通海镇向西流经10多公里后终于到达狼山东南方的海界河入江口——老洪港,其北为通州,其南为海门。从通海镇向西的海门地域民国以前被称为海门西区(1949年后划属南通)。海门西区的对江就是原常熟、江阴的沿江地区(今张家港市)。

16至17世纪,江阴与常熟两县沿江,由西北向东南显露出几片沙洲。时人依其形状、位置和洲上植被特点称之为紫鲚沙、横墩沙、关丝沙、蕉沙、刘海沙、盘篮沙和东兴沙等。这些沙洲因都是常熟县和江阴县的沿江涨出部分,故被统称为常阴沙。在不断的接涨过程中常阴沙并连成南沙、中沙、北沙三大片,这就是今日张家港市的港口镇、乐余镇等沿江地区。它是张家港“以港兴市”战略的发源地。今后张家港的沿江地区仍是最有潜力的发展地区。

常阴沙的开发始于道光年间(1821—1850),当时江北的海门沿江一带土地大片坍江,海门西区也是土地坍塌严重,而江南的土地在不断涨积。一向勤劳垦殖的海门人,他们曾经从崇明越江围垦出了一个清代的海门厅,现在他们又将再度越江,去围垦一个新的沙洲县。于是他们首先登上刘海沙、横墩沙、关丝沙以及盘篮沙、东兴沙等割青草、芦苇谋生,并渐有人上沙围垦,但都以失败告终。咸丰年间(1851年—1861年),海门西区的大安镇(今通州区川姜镇南兴村)人顾七斤在刘海沙首次围圩成功,于是不少人上也上沙围垦,其中也有江阴人和常熟人上沙围垦。据说顾七斤是围垦沙田最大的户主,号称“有沙田10万亩”。顾七斤从北沙片的毛竹镇(民国二年坍入长江)向东围垦至西界港,地名也从一圩港排到十三圩港。这些圩名至今仍在,如七圩港、八圩港、九圩港(九龙港)、十圩港和十一圩港。相传顾七斤还在九圩港口建造九龙镇。顾七斤及许多海门人的围垦又从海门内地带走了大量的海门劳动力,他们都操着家乡海门的口音,最后在那里定居下来。所以张家港有大量操海门口音(崇明话)的人,那是很自然的。

沙田围垦时就发生了通州、常熟、江阴三地的沙田归属之争。并诉讼到江苏布政使司,诉讼长达数十年之久,最后布政使司裁定根据江心位置,由常熟、江阴、通州鼎足三分,其中南沙片归常熟,中沙片归江阴、北沙片归通州(今南通)。而海门为什么没有参与这次纷争呢?一是顾七斤围垦前是向通州方面登记的沙案垦殖权,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领取了通州的围垦执照;二是这段时间海门正与崇明发生崇、海争沙,与通州发生州、厅争沙,各方的争斗都十分激烈,无暇顾及这场纷争,也就是说海门在常阴沙的这场争沙中等于主动放弃了权利。因而从有关的史料中当然找不到海门人移民张家港的记载,但像顾七斤那样一些有开拓精神的海门人,以及大量的穷苦海门人,他们参与了常阴沙这片土地的围垦和开发,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